

0009417

12.62
W68431

集全多一聞



XWTS 0012647



店書明開

聞 一 多 全 集

開 明 書 店

聞一多全集

(全四册)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三版

每部定價金圓五十元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上海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編輯者

朱自清
吳晗
鄭振鐸
葉聖陶

所有權不得翻印

K (50.00) 全(1213P)

郭序

最近吳辰伯先生把聞一多全集的稿子從北平給我寄了來，我費了兩個禮拜的工夫細細地校讀了兩遍，校補了一些謄錄上的錯誤和奪落，填寫了一些古代文字，更把全部的標點統一了。全稿的字數我沒有過細計算，大約總在一百萬字以上吧。在這裏面關於文化遺產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關於近代學識，特別是參加民主運動以來的著述，僅占極少數。因此從這整個的遺稿上便給了我一個這樣的印象：一棵茁壯的向日葵剛剛纔開出燦爛的黃花，便被人連根拔掉，毀了。

「千古文章未盡才」這是夏完淳哭他的內兄錢漱廣的一句詩，這兩三個禮拜來老是在我的腦子裏和口角上盤旋着。聞一多先生的大才未盡，實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他假如不遭陷害，對於民主運動不用說還可以作更大的努力，就在學問研究上也必然會有更大的貢獻的。

·一多對於文化遺產的整理工作，內容很廣泛，但他所致力的對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詩與詩人。關於秦以前的東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話傳說的再建之外，他對於周易，詩經，莊子，楚辭這四種古籍，實實在在下了驚人的很大的工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這樣感覺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賅博，立說的新穎而翔實，不僅是前

無古人，恐怕還要後無來者的。這些都不是我一個人在這兒信口開河，凡是細心閱讀他這全集的人，我相信都會發生同感。我現在姑且舉兩個例子在這兒。

第一，他有一篇詩新臺鴻字說解釋詩經 邶風 新臺篇裏面「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的那個鴻字。兩千多年來讀這詩的誰都馬虎過去了，以為是鴻鵠的鴻，但經一多先生從正面反面側面來證明，纔知道這兒的「鴻」是指蟾蜍即蝦蟆。古人會叫蝦蟆或蟾蜍為「苦蠶」，見廣雅 釋魚和名醫別錄 苦蠶就是鴻的切音了，苦蠶為鴻亦猶窟窿為孔，噉噉為亢，而更巧妙的是有一種草名叫屈龍的，別名也叫着鴻。淮南子 墜形篇「海閭生屈龍」，高誘注云「屈龍，遊龍，鴻也。」這確是很重要的發現。要把這一「鴻」解成蝦蟆，然後全詩的意義纔能暢通。全詩是說本來是求年青的愛侶卻得到一個弓腰駝背的老頭子，也就如本來是想打魚而卻打到了蝦蟆的那樣。假如是鴻鵠的鴻，那是很美好的鳥，向來不含惡義，而且也不會落在魚網子裏，那實在是講不通的。然而兩千多年來，差不多誰都以這不通為通而忽略過去了。

其次，再舉天問釋天裏面解釋「顧菟」的一條吧。「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這是問的月亮的情形。向來的人都把顧和菟分開來，認為顧是顧望，而菟就是兔子。到了清代的毛奇齡認為顧菟不能分開，是月中的兔名，算是進了一步。直到聞一多先生，纔又舉出了十一項證據來，證明顧菟就是蟾蜍的別名。蟾蜍一名居蟾，與顧菟實一音之轉。同一轉語則為科斗為活東，與蟾蜍實為一體。漢少室神道闕刻月中蟾蜍四足一尾，宛如

科斗後期之形，故知顧菟亦卽科斗。聞先生舉了十一例以證成其說，雖然他還在浩歎「既無術以起屈子於九泉之下以爲吾質，則吾雖辯，其終不免徒勞乎？」但我敢於相信，他的發現實在是確鑿不易的，並不是「徒勞」。

像這樣細密新穎地發前人所未發的勝義，在全稿中觸目皆是，真是到了可以使人墮瑟的地步。這樣一位富有發明力的天才，我隱隱地感覺着，可惜是用在文字學或文獻學這一方面來了，假如是用在自然科學或技術科學方面，不會成爲更有益於全人類的牛頓和愛迪生嗎？我固然無心要在文獻學和自然科學或技術科學中定出軒輊，用科學的方法來治理文獻或文字，其實也就是科學，但如站在功利的立場，那價值的廣狹，的確是大有由旬的。雖然在中國也儘有的是這樣的功利學者，認爲一個古字古義的發明實不亞於天文學家發現了一個星球。或許是吧，但我並不想那樣誇張地看，我相信聞一多先生也不會那樣誇張地看的。

聞先生治理古代文獻的態度，他是承繼了清代樸學大師們的考據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學的緻密。爲了證成一種假說，他不惜耐煩地小心地繙遍羣書。爲了讀破一種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徹底的準備。這正是樸學所強調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這種精神澈底地實踐了。唯其這樣，所以纔能有他所留下的這樣豐富的成績。但他的澈底處並不是僅僅適用於考據，他把考據這種工夫僅是認爲手段，而不是認爲究極的目的。請看他在楚辭校補的引言上所說的這樣的話吧：

較古的文學作品所以難讀，大概不出三種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時代背景與作者個人的意識形

態，因年代久遠，史料不足，難於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語言文字，尤其那些「約定俗成」的白字（訓詁家所謂「假借字」）最易陷讀者於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後作品而產生的傳本的譌誤，往往也誤人不淺。楚辭恰巧是這三種困難都具備的一部古書，所以在研究它時，我會針對着上述諸點，給自己定下了

三項課題：（一）說明背景，（二）詮釋詞義，（三）校正文字。

凡是古書，這三種困難都是具備着的，事實上並不限於楚辭，因而他所規定的三項課題，其實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獻上的共通課題，尤其是第一項，那是屬於文化史的範圍，應該是最高的階段。但中國自秦漢以來兩千多年，實在還沒有產生出過一部好的文化史。專家的研究也是同樣。漢儒的研究是在第二第三階段上盤旋，宋儒越躍了第三階段，只是在第二階段的影子上跳躍。清儒又回到第二第三階段上來，然而也只在這裏盤旋，陶醉於訓詁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越。這是當然的，要想知道「時代背景」和「意識形態」，須要超越了那個時代和那個意識纔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越那個時代和意識，那便無從客觀地認識那個時代和那個意識，不用說是更不能夠批判那個時代和那個意識。就像孩兒期中孩兒自身不明白自己的處境和意識一樣，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停滯也就必然地匯成了封建意識的污瀝。要澄清這污瀝，今天正是時候了。

我們再看一多先生在楚辭校補的引言中敘述着他的苦衷吧。他認為他所擬定的三項課題，最好是同時交卷，然而為情勢所迫，他一時不能夠全部完成，「只好將最下層，也是最基層的第三項——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

結束，而盡量將第二項——詮釋詞義的部分容納在這裏。」他認為這是「權變的辦法」，是他所極不願做的。然而爲了「可以騰出時間來多作點別的事」，他終於這樣做了。這引言是寫於民國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也正是民主運動開始發動的時候，我們看他這急急於想「騰出時間來多作點別的事」的苦心，不可以看出「多先生」以後的活動是早有部署在心的嗎？但我在這兒注意地引用到這段文字的用意倒側重在他對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具有全般的計劃，而且在完成計劃的各個步驟上的評價他是絲毫也沒有陷於自我陶醉的。「校正文字」和「詮釋詞義」的工作，這些正是考據家們的所兢兢焉樂道的事業，而在他只是基本的準備工作，而且「校正文字」還只是一最下層。這不明顯地表示着，他絲毫也沒有把自己的工作作過分的誇大嗎？他的楚辭補注，他自己看來既只是第二第三階段上的作品，我們準據着這同一的自白，也可以知道，他對於他的周易義證、詩經新義、詩經通義、莊子內篇校釋、離騷解詁等這樣一連串的在文字訓詁上極有價值的文字，在他自己也不過是視爲第二第三階段的工作吧了。其實這些著作，當代的考據家們，假使能有得一篇，也就儘足以自豪的事實上，他們是一篇也沒有，已經就在自豪了，一些舊式的或新式的衛道者，不是根本連字都不認識，便在那兒以仲尼復活、羅再生自命嗎，聞先生不是這樣的糊塗蟲，他雖然在古代文獻裏游泳，但他不是作爲魚而游泳，而是作爲魚雷而游泳的。他是爲了要批判歷史而研究歷史，爲了要揚棄古代而鑽進古代裏去剝它的腸肚的。他有目的地鑽了進去，沒有忘失目的地又鑽了出來，這是那些古籍中的魚們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

三十三年五月三日晚上，在昆明的聯大新舍南區十號教室裏，曾經舉行過一次五四歷史座談，據記錄，在周炳琳、張奚若等先生發言之後，聞一多先生發言。他曾經這樣說過：

剛纔張先生說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懷。但是你們現在好像是在審判我，因為我是在被革命的系——中文系裏面的。但是我要和你們裏應外合！

他這就是說鑽進「中文」——中國文學或中國文化——裏面去革中文的命。他說「封建社會的東西全是要不得的。我相信，憑我的教書經驗和心得，它是實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務就是要知道它的要不得，纔不至於開倒車。」今天搞中文的人，誰個是這樣的抱負舊式的衛道者，不用說他了，就拿現在一些搞「國文」的新式學者來說，不是月月都在那兒祖述桐城，甚至還在讚揚八股嗎？那些君子不用說不是中文的革命叛徒，簡直是唐宋盛世的輔命功臣了，要說猗歟休哉，也的確是值得說一聲猗歟休哉的！

然而一多先生卻不是這樣的功臣。他搞中文是爲了「裏應外合」來完成「思想革命」，這就是他的治學的根本態度。爲着要得虎子而身入虎穴，決不是身入虎穴去爲虎作倀。他在寫考證文字的時候，照例使用文言，但他認爲「未能免俗」，他夢想着要用白話文來寫考證文字。這也是見於楚辭校補、引言裏的話，可見他在迫不得已使用文言時，都沒有忘記要揚棄文言。但他在第一階段的工作——即最上層的批判時代背景與意識形態上，他是斷然把文言揚棄了的。這段工作，他雖然做得不多，但已經開始在作，而且在作的過程中，他自己的意識形態

已經有了變遷和改進，也是可以明白地看出的。這可以把他的莊子和人民詩人——屈原兩篇文章拿來做證明。一多先生不僅在莊子的校釋上做了刻苦的工夫，他另外有一篇題名就叫「莊子」的論文，直可以說是對於莊子的最高的禮讚。他實在是在那兒誠心誠意地讚美莊子，不僅陶醉於莊子的汪洋恣肆的文章，而且還同情於他的思想。請看下面的這些摘錄吧。

有大智慧的都會認識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實有，卻不像莊子那樣熱忱地愛慕它。

是詩便少不了那一個哀豔的「情」字。三自篇是勞人思婦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莊子的情可難說了，只超人纔載得住他那種神聖的客愁。所以莊子是開闢以來最古怪最偉大的一個精神。

讀莊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層的愉快。你正在驚異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躊躇的當兒，忽然又發覺一件事，你問那精微奧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樣湊巧的曲達圓妙的辭句來表現它，你更驚異，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竟許甚麼也不是，而是經過化合作用的第三種東西，於是你尤其驚異。這應接不暇的驚異，使你加倍地愉快，樂不可支。這境界，無論如何，在莊子以前，絕找不到，以後，遇着的機會確實也不多。文中之支離疏，畫中的達摩，是中國藝術裏最特色的兩個產品。正如達摩是畫中有詩，文中也常有一種「清醜入圖畫，視之如古銅古玉」梁自珍書金伶的人物，都代表中國藝術中極高古，極純粹的境地；而文學中這種境界的開創者則推莊子……這種以醜爲美的興趣，多到莊子那程度，或許近於病態，可是誰知道，

文學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

這和死、水中所表現的思想有一脈相通的地方。你看他那陶醉於莊子的「樂不可支」的神情！他在迷戀着「超人」，迷戀着「高古」，「神聖」，「古銅古玉」，「以醜爲美」（死、水的主要傾向便在刻意於此），甚至於迷戀於莊子的「道」，「認識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實有」的是「有大智慧的」人，意在言外地憧憬着要「像莊子那樣熱忱地愛慕它」。莊子的「道」是什麼？那是我們中國古代的黃老學派所懸擬的宇宙萬彙的本體。眼前的宇宙萬彙是可視可聞可嗅可觸的感官界，但這感官界的來源是有一個超越於感官的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嗅不可觸的實質的本體，那本體的名字就叫着「道」。宇宙萬彙都是這「道」的化身，一切變化都是「道」的活動。「道」是宇宙萬彙的創化者，也就是宇宙萬彙的真正的主宰者（「真宰」）。所以「道」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前一時代的所謂「上帝」的混沌化，「上帝」是有眼耳口鼻的人形，「道」是沒有眼耳口鼻的混沌而已。萬物都是「道」，也就是說萬物都是神。莊子的思想在我們中國古代本是一種汎神論的思想。這種思想和印度的古代和希臘的古代某些形而上學家的想法是共通的，在反對神，反對宗教，反對建立在教權上的統治方式上，很有足以使人迷戀的地方，而加以莊子的古今獨步的文筆，的確是陶醉了不少的人。我自己在年青的時候也就是極端崇拜莊子的一個人，就是晚年來反對莊子最力的魯迅，他也很稱贊莊子的文章，甚至於也沾染過莊子的思想。魯迅自己說過：「就在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和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寫在墳的後面，但魯

迅是從莊子思想中蛻變了出來，聞一多也同樣把莊子思想揚棄了。

聞一多揚棄了莊子思想，這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這表現在他日後一轉而痛罵道家了。

一個儒家做了幾任「官」，撈得肥肥的，然後撒開腿就跑，跑到一所別墅或山莊裏，變成一個什麼居士，便是道家了。關於儒·道·土匪。

他斥墨家是土匪，儒家是偷兒，道家是騙子。他說「講起窮兇極惡的程度來，土匪不如偷兒，偷兒不如騙子，那便是說墨不如儒，儒不如道。」這是把道家思想清算得很痛快的。

如其從對於文化史的貢獻上來說，這層思想的轉變，可以說很具體地表現於他的由莊子禮讚轉而為屈原頌揚。

我們在上述莊子一文中看見他以屈原和宋玉並稱，說「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沒有莊子偉大，這完全是一種舊式的看法。但在人民詩人——屈原裏面，看法便完全不同了。「是什麼使得屈原成為人民的屈原」？他舉出了四種原因。第一，屈原雖然是楚國的同姓，卻「早被打落下來，變成一個作為宮廷弄臣的卑賤的伶官……這樣，首先在身分上，屈原便是屬於廣大人民羣中的。」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離騷的形式，是人民的藝術形式……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第三，「在內容上，離騷無情地暴露了統治階層的罪行，嚴正地宣判了他們的罪狀……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憤怒。」第四，「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緒提高到爆炸的邊沿，

只等秦國的大軍一來，就用潰退和叛變方式，來向他們萬惡的統治者，實行報復性的反擊。歷史決定了暴風雨的時代必然要來到。屈原一再的給這時代執行了「催生」的任務。」

這四種條件，在他認為，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爲真正的人民詩人。「儘管陶淵明歌頌過農村，農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頌過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爲他們既不屬於人民，也不是爲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爲着人民的，然而人民聽不懂他的話。屈原雖沒有寫人民的生活，訴人民的痛苦，然而實質的等於領導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稱爲人民詩人的人。」

就這樣，聞一多先生由莊子禮讚變而爲屈原頌揚，而他自己也就由絕端個人主義的玄學思想蛻變出來，確切地獲得了人民意識。這人民意識的獲得也就保證了新月詩人的聞一多成爲了人民詩人的聞一多。假使屈原果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稱爲人民詩人的人」，那麼有了聞一多，有了聞一多的死，那「唯一」兩個字可以取消了。屈原由於他的死，把楚國人民反抗的情緒提高到了爆炸的邊沿，聞一多也由於他的死，把中國人民反抗的情緒提高到了爆炸的邊沿了。替人民報仇者，人民亦必爲之報仇，爲革命催生者，革命亦必爲之催生——催向永生的路上行進。

聞一多毫無疑問是永生了。他真正是「求仁得仁」，他不僅在做學問上獲得了人民意識，而在做人上更保障了人民意識的確切獲得。然而話又得說回來，他的很快地便被催向永生，在一多自己雖然是一種至上的成就，

在人民也就是一種歷史的收穫，然而很苦痛地是伴隨了一個過高的代價。假如在「多」獲得了人民意識之後，再多活得十年，讓他在事業上，在學問上，更多多地爲人民服務，人民的收穫想來也不會更微末的吧？在他把文化史的批判工作的準備剛好完成，正有充分的資格來擔當批判過去，創造將來的時候，卻沒有讓他用筆來完成他的使命，而是用血來完成了，不能過分矯情的說，這不是重大的損失。

「千古文章未盡才，」在今天我讀着「多」的全部遺著，在驚歎他的成績的卓越之餘，仍不能不爲「中國」的人民，不能不爲人民本位的「中國」文化的批判工作，懷着無窮的隱痛。「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個人起來！」在革命工作上我虔誠地希望能夠這樣，在爲人民服務的學術工作上我也虔誠地希望能夠這樣。

郭沫若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



朱序

聞一多先生爲民主運動貢獻了他的生命，他是一個關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時期的不同而或隱或現。大概從民國十四年參加北平晨報的詩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島大學，可以說是他的詩人時期，這以後直到三十二年參加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五四歷史晚會，可以說是他的學者時期，再以後這兩年多，是他的關士時期。學者的時期最長，關士的時期最短，然而他始終不失爲一個詩人，而在詩人和學者的時期，他也始終不失爲一個關士。本集是承藏克家先生鈔來三十二年他的一封信，最可以見出他這種三位一體的態度。他說：

我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火燒得我痛，卻始終沒有能力（就是技巧）炸開那禁錮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熱來。只有少數跟我很久的朋友（如夢家）纔知道我有火，並且就在死水裏感覺出我的火來。

這是關士藏在詩人裏，他又說：

你們做詩的人老是這樣窄狹，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詩什麼也不存在。有比歷史更偉大的詩篇嗎？我不能想

像一個人不能在歷史（現代也在內，因為它是歷史的延長）裏看出詩來，而還能懂詩。……你不知道我在故紙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麼，它的目的何在；……因為經過十餘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症，我敢於開方了。方單的形式是什麼——一部文學史（詩的史），或一首詩（史的詩），我不知道，也許什麼也不是。……你纏住了我，當我是一個蠶魚，不曉得我是殺蠶的芸香。雖然二者都藏在書裏，他們的作用並不一樣。

學者中藏着詩人，也藏着鬪士。他又說「今天的我是以文學史家自居的。」後來的他卻開了「民主」的「方單」，進一步以直接行動的領導者的鬪士姿態出現了。但是就在被難的前幾個月，他還在我說要寫一部唯物史觀的中國文學史。

聞先生真是一團火。就在死水那首詩裏他說：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這不是「惡之花」的讚頌，而是索性讓「醜惡」早些「惡貫滿盈」，「絕望」裏纔有希望。在死水這詩集的另